



人文译丛 总主编◆何怀宏

# Strong Democracy

## 强势民主

[美]本杰明·巴伯◆著

彭斌 吴润洲◆译

吉林人民出版社

Jil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人文译丛 总主编◆何怀宏

# Strong Democracy

## 强势民主

[美] 本杰明·巴伯 ◆ 著  
彭 斌 吴润洲 ◆ 译

吉林人民出版社

JIL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强势民主 / (美)巴伯著;彭斌,吴润洲译.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11

(人文译丛)

ISBN 978-7-206-07192-8

I. ①强…

II. ①巴… ②彭… ③吴…

III. ①民主—理论—研究

IV. ①D0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96819 号

## 强势民主

著 者:(美)本杰明·巴伯 译 者:彭 斌 吴润洲

责任编辑:崔文辉 李 蕊 封面设计:张 迅 孙浩瀚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长春市人民大街 7548 号 邮政编码:130022)

制 版:吉林人民出版社图文设计印务中心

印 刷:长春方圆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720mm×1000mm 1/16

印 张:24.75 字数:343 千字

标准书号:ISBN 978-7-206-07192-8

版 次:2011 年 1 月第 2 版 印 次: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46.0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 总序

中国乃一文明古国，而人文精神又于其间特见其长。“周文”已灿然可观，而孔孟老庄荀韩等先秦诸子更大略厘定此后二千年中华文化发展基本格局，且时有奇葩竞放，异彩纷呈。然近代以来遇强劲欧风美雨，不免花果凋零。究其因，既有外来文明之横决，亦有自身后继之乏力。

今日世界一体，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可能孤立发展乃至生存，古老的华夏文化更有从域外接引各种源头活水之亟须。百年来国人译事多多，今不揣浅陋，亦立此一“人文译丛”，名称不惮其大，俾使各种有价值译著多能收入其中，且有愿为中华人文复兴略尽绵薄之意焉。

译丛取材选目则不吝其小，且力求主题相对集中，现约略勒成数专辑：一曰西方古典思想与人物，尤以古希腊为要。二曰西方政治理论与实践，特重近代以来作为西方思想制度主流之自由民主的发展。三曰知识分子与自由市场，全球化使我们皆卷入市场经济，而人文知识分子对此的态度尤可玩味。四曰基督精神与人文，此种超越性大概正是较现实的中华人文所需特别留意处。五曰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罗斯思想，藉此希望国人眼光也能注意我们近邻心灵的深邃。六曰《学术思想评论》，由贺君照田主编，其中有译有评，最近几辑尤注意中西历史交叉延入“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

数年来能有此初步实绩，端赖吉林出版界领导周君殿富、

胡君维革大力支持及责编与诸多译校者鼎力相助。“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文复兴并非“指日可待”之事，我们愿使“人文译丛”成一长久事业，除继续充实现有专辑外，亦将开辟新专辑，并深祈此一事业继续得到各界同人的关注与支持。

何怀宏

2002年11月18日

谨识于北京西郊泓园

# 重版总序

凡是在出版业工作的人都知道一句行话，叫做“选题定位”，或曰“图书定位”，亦曰“市场定位”。我非常赞成这句话。一个出版社必须进行明确的选题定位，只有明确的选题定位，才能打造图书品牌乃至出版社品牌，只有有了品牌才能占领市场，出版社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近些年来，我社的选题定位是十分明确的，就是主打国内外学术类图书。就国内的学术著作而言，我社先后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60年实录》（10卷）、《北大哲学门》（10卷）、《高清海哲学文存》（6卷）、《孙正聿哲学文集》（9卷）、《楚辞源流选集》（5卷）、《中日甲午战争全史》（6卷）、《毛泽东评点的帝王大传》（16本）、《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学术文库》（6卷）等高档次、高品位的学术著作，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较好的影响。就国外的学术著作而言，我社先后引进出版了《人文译丛》（60本）、《绿色经典文库》（16本）、《大美译丛》（8本）、《支点丛书》（10本）、《世界经济畅销书系》（10本）、《人类文明史图鉴》（24本）、《西方社会科学基础知识读本》（22本）、《美国思想史》、《西方建筑史》、《剑桥战争史》、《剑桥医学史》等在世界上较有影响的学术著作，受到了国内学术界的好评。从总体上说，图书的价值主要在“传承”和“传播”4个字上。“传承”是就历史纵向而言，图书要为后人传承人类创获的思想文化成果；“传播”是就历史横向而言，图书要向世人传播人类创获的思想文化知识。我社出版的学术类图书，虽然远远没有达到这个境界，但我们一直向着这个方向努力。

在我社引进出版的外国学术类图书中，最有影响的是何怀宏先生担

任总主编的《人文译丛》这套丛书。何先生是一位学术精深、工作认真、待人诚恳、诲人不倦的专家学者。为编好这套丛书，他亲自确定书目、遴选译者、审阅书稿，每一本书都饱含了他的心血。功夫不负苦心人，经过10年的努力，到现在这套丛书一共出版了60本。一个地方人民出版社能够出版一套60本的外国学术著作丛书，实属不易。每当看到这套丛书时，我们总是对这套丛书的总主编何先生产生由衷的敬意。

为了更好地保护《人文译丛》这套品牌性图书，最近，我社调集30多名资深编辑，对这套丛书进行了重新出版。在重版过程中，我们主要做了以下三项工作。第一，将已经出版的《人文译丛》中的图书悉数收入，同时又从我社出版的外国学术著作中选出20本，加在《人文译丛》中，使《人文译丛》总量达到80本。第二，将收入《人文译丛》的80本图书，统一开本，统一纸张，统一版式，统一封面风格。第三，对80本图书进行重新编辑校对，对个别图书的有些文字或段落进行了处理。通过以上工作，使这套丛书更加完善了。

有人说：翻译出版一本外国学术著作，比自己撰写出版一本学术著作还要难。这话很有道理。由于我们水平有限，重版的《人文译丛》尚存在着以下三点不足。第一，有个别图书，从学科属性上讲，放在《人文译丛》中不甚合适，敬请广大读者原谅。第二，有些图书中的个别译文还不够准确，编校也不够到位，敬请广大读者指正。第三，有些图书中的思想观点，囿于历史局限，我们不能接受，敬请广大读者进行批判性的阅读。

重版《人文译丛》，对我社来说，既是一个巨大的工程，也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在三个多月的工作中，全体编辑、校对、照排和印制人员都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令我感动不已。在此书即将付梓之际，我真有许多感谢的话要说，纸短情长，不尽一一。

胡维革

2010年9月28日

于长春百汇街寓所

## 二十周年纪念版序言

《强势民主》出版 20 周年以来，平等与自由，社群与个人主义，参与式民主与代议制民主之间微妙的辩证关系仍然没有发生多大的改变——它们之间的关系仍然像过去几百年中那样，充满了矛盾和紧张。但是，这些关系所依赖的环境却一直在改变，甚至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在发生急剧的变化。社群主义者（communitarian）对自由主义式的个人主义的批评已经发展成为真正的公民运动，并且在美国两个主要政党中赢得了政治上的胜利，例如在国家公共服务方面。但是，无论是对左派还是对右派而言，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国外，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主张和反对“大政府”的观念同时也已经成为选举政治中根深蒂固的、必不可少的意识形态方面的条件。1996 年，克林顿总统明确宣告“大政府的终结”似乎已经隐含了把某种关于公共物品的哲学作为民主的目的来接受的理念。当那些进步的民主主义者也很难举出一个对民主有利的有效证据时，那种认为持有基本民主权利的民众为了承担各种共同任务而共享他们的资源和发现共同意志的说法也就显得令人怀疑，更不用说更进一步的强势民主了。

无论是在美国国内还是在国外，在 20 世纪 70 年代已经很明显的民主的弊端在更大的范围内蔓延开了。那些名义上的民主国家的数量一直在增加——今天，还有哪个国家不喜欢将自己称为民主政体呢？但是，那些确实在实行民主的国家则是数量有限的，而且我们甚至不能认为美国也总是能够包含在民主国家的行列中。



我在 20 年前就曾指出，科学技术和通讯是进行民主改革的至关重要的调节器。它们一直在进步，现在，它们不仅给参与式民主带来了可喜的机遇，而且也带来了诸多的挑战。同时，20 世纪后半叶的全球化进程开始逐渐侵蚀作为传统民主基础的国家主权，这在新世纪里成为了政治和经济景观中最显著的特征。我在《圣战 vs. 麦当劳世界》（1995）<sup>[1]</sup>《权力的真相》（2001）与《恐怖的帝国》（2003）等著作中不仅考察了全球化进程对全球经济、文化、恐怖主义和反恐战争的重要影响，而且考察了那些决定全球化的进程也通过各种重要方式明显地影响着民主的发展。

强势民主不仅仅只是可以被评价为能够矫正美国民主弊端的革新，而且现在必须用全球化的视角去审视它。当许多国家从共产主义的束缚、军人政府长期阴暗的统治和反动的神权政治中过渡到介于无政府状态和民主之间的苦难状态时，也就给新的民主形式和新的暴政形式都带来了机遇。这既使得全球民主的图景变得复杂了，同时也产生了关于后现代社会中民主问题的新争论：什么样的制度（如果有这样的制度的话）才能使阿富汗、克罗地亚、乌干达、伊拉克等国家以及那些出现麦当劳世界和圣战相对峙的社会实现民主化呢？民主化就一定意味着美国化吗？或者，反过来说，美国化就一定是民主化吗？是否政治的市场化、经济的私人化就相当于民主（也就是指那种业已失败的后苏联时代的“民主化”构想）呢？政治市场化与经济私人化是民主发展所必需的（或是可能需要的）条件吗？或者说，民主与资本主义是一致的还是可能不相容的呢？无论强势民主还是弱势民主，是应该将它看做单数的还应该看做复数的呢？它是意味着整齐划一的模式，还是表明可以适用于多种独特文化环境的能够进行改变的过程呢？换言之，本书的标题更命名为《诸种强势民主》（*Strong Democracies*）是否更为合适呢？

在全球化的世界中，仅仅从国内的视角去思考民主的本质和命运是不够的。全世界各国相互依赖的现实弱化了国家主权，使国家间的界限具有可渗透性。这就产生了新的问题，即采用什么类型的政府（如果有

这样的类型的话)才能监督国际关系或国家内部事务。当前,全球化涉及到商品、市场、犯罪、疾病、贫困、资本、毒品、武器和恐怖主义的国际化等许多问题,它向我们展示出由于主权弱化所带来的有害的和无政府状态的一面。但是,它没有描述诸如国际化的公民制度或者政治制度之类的东西,因为这些安排尚未出现。现在,国际关系要么是处于无政府状态(根本没有全球性的民主政府存在),要么是处于私人暴政的状态(由垄断性的跨国公司和决非民主的跨国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贸易组织[WTO]所操纵的市场力量),而不受任何建立在跨国的公民身份或者公民社会形式基础上的慈善的、具有建设性的相互依赖的新制度安排所管辖。所以,问题不再是美国、法国或者日本将能否继续保持代议制民主的“弱势”民主政体的形式,也不再是伊拉克、乌干达、哥伦比亚能否成为各种强势民主国家,而是在各种国家、非政府组织与国际资本机构(所谓的国际金融机构)之间日益显著的全球性关系上能否实现民主——不管是参与式民主或者是强势民主。

在这项工作中,研究上述基本的紧张状态对于民主的未来仍然是至关重要的,我将简要地阐述这些新挑战如何在一个日益增长的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的、科技进步的、寡头垄断市场的世界中使强势民主变得更加复杂的。这些挑战包括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力量使得对民主的追求发生变形,使得社群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批评发生偏差;包括正在变革的技术特性及其不断增加的垄断对强势民主的影响;也包括从暴政中挣脱出来的社会进行民主化的问题;还包括各种全球经济关系、公民关系与政治关系的民主化进程中可能发生的事情及其妨碍因素。

## 新自由主义

强势民主所采取的逻辑前提是政治优先于经济,并且,民主一旦在政治和公共领域里完全建立起来后,它可以确保多种经济体系共存状态能够具有充分的平等和正义,甚至在那些市场允许或滋生不平等的地方

也是如此。然而，民主与资本主义并非同义词。资本主义发展了个人自由，重视生产效率和企业家的身份，但是它自身的制度设计却忽视了平等，把利润置于人民之前，把产品置于工作之前。在人民管理的状态中，这些不平衡将能够得到弥补。传统民主资本主义的支持者坚决主张在经济领域内保持相对自由，但是，他们已经认识到并且（受到启发）鼓励通过民主政权的方式进行管理和监督。然而，在过去 25 年里，对福利国家中央集权下的经济统治和管制型政府存在着某种不满，这种不满与那种鲁莽的、掠夺性的市场资本主义观念结合起来后形成了一种强大的旨在摧毁民主资本主义脆弱的平衡的意识形态。

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被看做是对 20 世纪 60 年代（而不是 30 年代！）无节制的民主的回应，它不仅仅攻击那种具有强制性的、爱管闲事的官僚主义政府，而且攻击民主监督的观念。新自由主义的神话取代了政府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神话，它认为市场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而政府除了制造祸害外一事无成。这个神话导致了接受私有化、市场化和将私有部门“外购”（outsourcing）公共服务作为首要政策，并且把对代议制政府和强势民主政府的争论推到一边，转而支持这样的争论，即：政府能否在自由市场社会中扮演有意义的角色，无论它是强势的还是弱勢的。除了国防外，从教育、警务、监狱到交通、公共卫生和住房，任何公共物品或公共任务都可以看做是适合于自由市场经济的。事实上，即使是国防，私人部门也扮演着某种角色（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的战后阿富汗安全部队脱胎于美国的常规部队，但是现在已经私有化了；许多美军基地周边地区的安全事务都已经外包给了私人安全公司；在被占领的伊拉克，军队安全的重要部分以及公共重建工作已经被诸如 Halliburton, Bechtel 和 DynCorp 等私人公司控制了）。

当民主哲学家讨论强势民主、弱势民主以及民主参与者对新型参与和协商的公民制度安排的设计时，把民主政府看做是人们有权利集体监督他们公共财产的观点受到了攻击。如果影响人们命运的至关重要的决议根本不再由民主政府制定的话，那么人们通过参与机制直接实行自治

与通过授权机制让那些对他们负责的代表来管理社会又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这个时代的标志就是在以民主化的名义占领伊拉克之后，布什政府在伊拉克自由政府尚未建立起来的时候就为伊拉克人民的前途作出了决定，认为伊拉克应该有一个媒体、能源、重工业都实行私有化的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没有任何协商。没有伊拉克人的参与。什么都没有。然而，这个决定却确定了民主统治的核心意味着什么。抛开其优点不说，没有任何人会认为这种不对如何组织国民经济和如何对待媒体的问题进行讨论的状况是自由的。这就是新自由主义市场的神话赠送给我们社会的礼物，它简单地认为市场经济的建立是民主的先决条件，而不是将其看做是一种有局限性的选择。

然而，新自由主义的胜利和弱势的代议制民主的流行之间应该是有联系的。在那些人们习惯于直接参与公共决策而不仅仅是选择那些为他们作出决策的代表的民主政体中，那种攻击民主政府的人也就是想要攻击人民的独立自主。但是，在那些人们本身已经习惯于将他们的民主责任“外购”给选举出来的代表的地方，这看起来似乎是那些代表轮流将他们的责任委托和“外购”给私人部门的一种延伸——作为代表的“他们”和作为官僚机构的“它”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人民。当公众把他们的基本管理职责委托给代表的时候，这也就开始产生了一个异化的过程，其结果是败坏公共利益和共同立场的观念。这种异化会逐渐使民主变得无足轻重，会把在社会公共事务中本来应当进行协商的参与转化成为一种具有讽刺性的由媒体欺骗操纵的选举。其结果就会出现像2003年加利福尼亚州取消选举那样十分糟糕的事件，在这次选举中精英们先是鼓励全体选民宣泄他们的愤怒，接下来就谴责无节制的民主。总而言之，私有化、异化和对公民协商的滥用实际上在代议制民主中会比在强势参与民主中更加容易实现——这就是一种赞成强势民主的更为有力的论据。



## 科 技

《强势民主》是一本为了庆祝新通讯技术下民主的潜能而发表的早期著作。它在网络革命之前出版发行得很好。然而，它建立在新的交互作用形式——例如，像 Warner—Amex 公司的用户也能参与部分节目的双向有线电视系统——的早期实验基础上，其目的是为了证明，在规模庞大的社会中面对面的交流受到限制的情况下，大众传媒的新形式能够为大众社会中的强势民主提供便利。因为沟通是民主的关键，政治对话将战胜政治暴力，那种能够在时间和空间上允许规模广大的集会——一个新型民主的“电子疆域”——的通讯革命在 20 世纪 80 年代看起来将预示直接民主和协商民主的新的可能性。在那些曾经受到会议场所大小、集会规模或公共空间限制的地方，现在电子和数字通讯使参与决策变得更为迅速，这将会使一个全球性的集会成为可能；同时，令人头疼的直接民主曾经使美国的国父们把他们的宪法马车拴在一个辉煌的但是花费巨大的代表制度的设计上面，而电子技术和数字通讯的普及将一劳永逸地解决规模的问题。

虽然新型数字媒体的技术潜力在今天仍然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人们的心理却比以前那些热心于民主的人所期盼的更加复杂了。正如许多评论家已经注意到数字媒体给民主带来的问题那样，像明尼苏达州电子民主 (Minnesota E—Democracy)，电子自由基金 (the Electronic Freedom Foundation)，哈佛大学伯克曼研究中心 (Harvard's Berkman Center)，耶鲁大学信息社会工程 (Yale's Information Society Project) 和马克尔基金 (the Markle Foundation) 等许多机构都一直在探索电子民主的潜力。像 Larry Grossman, Ted Becker, James S. Fishkin, Steven Clift, Peter M. Shane 和 Andrew Shapiro 等许多支持者仍然是很乐观的，他们在坚持自己信念的同时已经在研究现实社会的方案。然而，新技术的某些特征并不能很好地服务于强势民主。例如，它们快得惊人的速度和瞬时到达的特性通常

妨碍和危及到民主协商，因为作出理性的、民主的决议恰恰是一个费时的、深思熟虑的过程。通过网络的瞬时投票表决绝不是强势民主所开出的处方，而是公民投票表决的暴政。正如卡斯·森斯坦（Cass Sunstein）在《网络共和国》（Republic.Com）所极力表明的那样：根据特殊利益向相互隔绝的不同私人听众发表意见的网络，倾向于破坏推动那些必须学会共同生活与管理公共事务的具有冲突利益的陌生人之间进行辩论的民主要求。

然而，比这些实际问题更麻烦的是谁拥有新型电信科技的问题。虽然它们的技术潜力是以复数形式表现出来的，并且拥有宽带和频谱范围广泛的优点，但是它们的所有权却更加具有垄断性，其趋势是变得日益狭窄。通讯部门市场化和商业化的胜利反映出社会普遍地市场化和商业化，这意味着，对于民主和公共事业而言网络所具有的相当大的潜力已经在实践中大打折扣。今天，网络生活的主导形式既不是公共生活的也不是民主生活的，而是商业性的。网络类似于一个实际上的购物中心，也就是说，它甚至连那种在私人商业社区购物中所具有的最少量的公共特征也在支持私人消费世界的过程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令人惊奇的是，在世界范围的网络中足足有 1/3 的部分被用于色情业（也就是说从一开始网络就是让人喜爱的商业活动）。

总之，因为科技至少在开始时就已经趋向于反映和巩固而不是改变它们所在的社会，所以，25 年前这个新型的原始民主的电子数字科技看起来是具有如此广阔的发展前景，但是，事实上它现在已经变成了对抗强势民主的一部分，而不是去解决强势民主所存在的问题。我认为，找到将科技融合进强势民主的策略的方法并不取决于科技本身，而是取决于政治意愿，因为科技在很多方面依然是肯定民主的。

## 从暴政走出来的社会的民主化

早期的关于“强势民主”争论表明，像美国那种管理完善的代议制



民主中，应该为更大的公民协商和公民参与提供场所。它的目的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用强势民主去取代代议制民主，而是用在第十章中所预示的那种重要的参与制度来使得弱势民主变“厚”。然而，将改良主义适用于已经确立的民主政体的方式与在那种对于民主一无所知的国家中如何建立民主的理论并不是一回事。建立在享有自由权利、尊重法律以及包含着多元主义、宽容与开放社会等核心信念的“公民信仰”基础上的参与制度比那种没有这些基础的参与制度更容易形成。事实上，我认为自由主义式的个人主义的最大的优点就是它在面对集体主义暴政时所具有的激进品质以及它能够促进民主化的进程——如果它并不总是维护民主的话。所以，它适应于现在全世界以人权的名义而不是民主的名义所进行的争取自由的斗争。“给我自由”是“给我公民身份”的必要前奏，而“给我公民身份”则是先于“给我民主”的呼声！即使现实社会所采取的自由逻辑是运用其他的方式，但是它也是建立在公民身份基础上并依赖于民主的。那么，强势民主的哲学是如何适应那种从共产主义、军人政权或者神权政治中走出来的社会的呢？在伊拉克、克罗地亚或者尼日利亚等正在培育民主的国家中，美国和联合国是应当集中关注于参与制度还是应当满足于培养对法律、宪政和权利的高度尊重呢？

因为权利是建立公民身份的产物而不是其条件，所以，把关于权利的华丽言辞与享有公民教育、公民身份和建立公民社会的基本策略联系起来可能是很明智的。此外，那种有助于点燃政治斗争的权利语言终结了缺乏公共基础的上下垂直的政治与法律体系，而这种制度在从暴政到民主的过渡阶段的混乱状态中是不可能幸存的。当然，美国是从依赖于法治的弱势民主和促进代议制政府的体系中开始其宪政生活的，但是，这种宪政传统植根于一个世纪以来殖民地居民的公民经验，这种经验使得移民具有强烈的地方公民身份和地方自治的意识。当美国建国 50 年后托克维尔访问美国时，他注意到并且倍加称颂上述优点——他公开宣称，在美国，自由是地方性的！

当我们考虑新兴社会的民主的时候，在构建一种只有通过拥有公民



能力的全体公民才能真正发挥作用的组织严密的制度之前，确立起教育机制和公民的社会地位对于培育正在形成的公民身份是极其重要的。麦迪逊警告说，在一个民主制还没有建立的国家中，如果没有受过教育的、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公民，那么权利法案只是一堆写在纸上的东西。用约翰·亚当斯的话来说，建国者深深地懂得，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希望成为“无知的和自由的……那就是希望一事无成”。正如我在这里所指出的，强势民主能够弥补古老的自由主义民主的缺陷，而且，它甚至证明，只有通过理解公民身份的价值才能帮助世界上部分国家与地区稳固持久地建立起新型的民主。

## 全球的强势民主？

如果疆域规模的问题会限制强势民主的范围，那么全球治理看起来是不适合于强势民主的舞台。能否有一个 60 亿人的公共政策呢？某些人所认为的在宗教信仰、种族和文化上存在着一种名符其实的文明冲突的人们能否组成共同体呢？欧洲的共同市场用了 60 年才产生出共同的货币，那么全世界又需要多久呢？诚然，甚至从全球化的水平来看，民主管理将取决于全球公民身份、全球公民社会和全球公共意识的塑造。除非具有协调全球市场的无政府状态、疾病瘟疫、武器、犯罪、生态灾难和恐怖主义以及建立在强势的全球性公共协商基础上的新型的共同管理制度，否则流行的、持续的无政府状态将会支配全球社会交往体系。事实上，最近在全球治理中成功的改革已经关注非政府组织（NGO）、演进中的世界公共舆论与非政府形式的公共交流，而不是正式的、上下垂直管理的政治体系。由跨越国界发挥作用的公民所创建的全球公共运动引起了全球性的公共舆论，近年来这已经在许多重大国际事件上取得了成功，例如，《国际地雷公约》的通过，智利的独裁者奥古斯都·皮诺切克（Augusto Pinochet）在西班牙的被捕（其后，他在英国的审判由于健康原因而中断），以网络为基础的“反全球化”运动在葡萄牙的波尔图（Porto



Allegre) 所拥有的社会论坛——它的积极活动和通过传媒力量所进行的运动使得管理国际金融资金的力量民主化了。运用类似的方法，非正式的强势民主力量与非政府组织——例如，国际医生 (Doctors Without Borders)，人权观察 (Human Right Watch)，透明国际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征收金融交易税以援助公民协会 (Attac) 与 Move On <sup>[2]</sup> 等非政府组织——之间相互促进。这一切都表明，全球治理很有希望及时地产生于公民行动及其公民组织中，而不是产生于政府和国际管理机构中。

在一个恐怖主义和反恐战争的年代，对于全球民主而言，积极的公民身份的角色减弱了恐怖的强大影响，同时也加强了公共的全球协商的重要性。民主协商为由恐怖主义以及布什政府对恐怖活动的反应所带来的政治恐怖提供了可能的选择。恐怖的帝国 (我最新著作的主题与书名) 是一个没有公民的帝国，那里只有消极被动的观众怀着恐惧与敬畏的心情观看“罪犯”与“执行者”之间你死我活的拼杀。在公民共和国中，忙碌的公民将丢掉恐惧积极投身于民主之中。在美国，这意味着国家应当懂得如何协商、如何投票表决并且如何对其公共安全承担起责任；相反，如果只知道如何选举和罢免政客以及如何购物，那么它便会更加被动地依赖于好战的保护者来保护它自己。在世界范围内，这意味着人们应当自己管理自己，否则他们就会像陷入绝境的人一样走进充满绝望的死胡同。在这种情况下，无权无势将产生愤怒，而愤怒则只能通过暴力与恐怖主义来发泄。

在今天这种变化无常的全球市场和全球恐怖主义的氛围中，强势民主的魅力是显而易见的。这就如它在古代城邦中，在近代欧洲城镇的世界中，在那种刚刚产生并寻找符合它们独立自主的政治身份形式的民族国家中，或者就像在新大陆的大型疆域中探索新的适合于共和主义原则的美国革命时期那样。毫无疑问，发生在本世纪后四分之一时期的事件使关于强势民主的争论更加复杂，而批评者将继续采用直接投票和精英操作的罢免选举来混淆强势民主，事实上这些做法正是缺少强势民主的证明。但是，从根本上讲，变化的情况使强势民主对于维护自由而言甚